

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四辑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编

紫禁城出版社



083

9

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四辑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编

鸿禧美术馆 赞助

紫禁城出版社

主编：许爱仙

编委：王莉英 李知宴 朱传荣

顾问：叶文程 李辉柄 汪庆正 安金槐 朱伯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4辑 / 《中国古陶瓷研究》编委会
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9
ISBN 7-80047-238-8

I. 中… I. 中… III. 古代陶瓷-研究-中国 N.R876.
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0452 号

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四辑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制版中心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16 印张：16

字数 220 千字 图版 185

1997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7-238-8/K · 106 定价：40 元

1 1985年杭州治理古中河工程中拾到的瓷片

2 低岭头所出官窑类瓷残片

3 低岭头所出官窑类瓷残片



4 福建平和南胜田坑窑的素三彩瓷片

5 福建平和南胜田坑窑的素三彩瓷片



6 湖泗窑瓷枕



7 刻有“大中祥符四年十月”的器底 宣州晏公窑址





8、9、10

洪武釉里红地白缠枝花卉大碗





11、12 左：清康熙仿明万历青花梵文莲花式盘
右：民国仿明万历青花梵文莲花式盘（残片）



13、14 明万历青花梵文莲花式盘



目 录

- 中国陶瓷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冯先铭** (1)
- 陶瓷研究的科学与求实
- 怀念先师陈万里先生 **李辉柄** (6)
- 论耀州窑瓷器的发展和艺术成就 **李知宴** (10)
- 南京明故宫出土陶瓷综述
- 兼析南京明初功臣墓出土瓷器珍品 **张浦生** (32)
- 茶文化与陶瓷茶具 **王莉英** (41)
- 青瓷莲花尊研究 **刘毅** (48)
- “天目”新考 **欧阳世彬 李燕飞 欧阳之川** (56)
- 论天目窑 **姚桂芳** (63)
- 论越窑生产的黑釉瓷 **林士民 俞敏敏** (76)
- 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
- 从低岭头谈起 **沈岳明** (84)
- 上虞汉代黑釉陶瓷生产初探 **章金焕** (93)
- 关于蒋祈《陶记》所载的“建阳窑” **林志干** (97)
- 福建磁灶土尾垵窑址瓷器的装饰工艺 **栗建安** (109)
- 福建平和南胜田坑窑的素三彩略探
- 高健 李和安 郑辉** (116)
- 闽南所见漳窑瓷器探讨 **王文径 王燕凤** (131)
- 福建平和青花装饰艺术及时代特征 **林尊源** (137)
- 明洪武釉里红直口大碗之浅见 **舒佩琪** (143)
- 浅谈永宣青花瓷器的伊斯兰因素 **王健华** (152)
- 关于杭州出土元青花观音像年代的两点考证 **沈芯屿** (155)
- 淮南市博物馆藏寿州窑瓷器述略 **徐孝忠** (158)
- 六朝青瓷装饰艺术概论 **徐伯元 杨玉敏 徐凤华** (164)
- 论长沙窑的历史地位 **王文强** (172)
- 关于长沙窑彩瓷应是高温釉上彩的讨论 **蔡毅** (178)

“火照”探微 陈文学	(183)
钧窑系的形成与石湾窑仿钧 赵青云 于德云	(189)
浅谈马六甲海峡“戴安娜”号沉船中的清代 外销瓷 周世荣	(196)
再谈南宋修内司官窑 金志伟 金军	(202)
宣州窑白瓷的发现与探索 张勇 李广宁	(205)
广东雷州市古窑址调查与探讨 邓杰昌	(210)
湖泗窑初探 熊跃泉 贺世伟	(219)
石门矾窑址的发掘及有关长沙铜官窑的 几个问题 黄纲正	(226)
康熙及民国时仿万历青花瓷器例析 吕成龙	(233)
晚明瓷器鉴藏风尚转向探研 刘朝晖	(237)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96建阳年会暨学术 讨论会评述 谢道华 梅华全	(242)
鹧鸪斑建盏试制报告 陈文钦 欧华伶 林水妃 陈英	(246)
后记	(248)

中国陶瓷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冯先铭

编者按：本文是根据冯先生1991年访问日本时的录音整理而成，古陶瓷研究会论文集在中断多年之后得以重新出版，特选本文以纪念冯先铭先生。

今天的演讲题目是长谷部乐尔和佐久间重男两位先生商谈确定的，这个题目比较大，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说清楚的。1988年10月我患心区疼痛病，遵医嘱休养了两年多，在此期间暂与陶瓷断绝关系，对于新信息与重要发现不能亲临现场了解，消息闭塞。但我愿尽力围绕这题目来谈，不妥处望见谅。

1975年开始酝酿编写的《中国陶瓷史》，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82年正式出版发行。《中国陶瓷史》问世后受到国内外陶瓷界的普遍欢迎与重视，台湾很快翻印出版，国外出版界要求出英文、日文与德文本。日本陶瓷学者尤其重视，以长谷部乐尔先生为首，成立了“中国陶瓷史研究会”。所有这些，客观上促进与加快了我国陶瓷史研究的进程与步伐。

十年来陶瓷考古多侧重在与我国陶瓷史紧密相关的问题，窑址调查发掘选点则以历代名窑为主要对象。北方地区的邢窑、定窑、磁州窑、汝窑和耀州窑，江南地区的越窑、梅县窑、建窑、南宋官窑和景德镇窑，其中有的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此外，皇亲贵族墓葬、寺庙地窖与窖藏出土了不少历代瓷器珍品，也解决了我国陶瓷史上存在的若干问题。以下择要讲近十年的重要收获。

一、内丘邢窑遗址的发现 继1980年发现临城祁村窑址之后，内丘县文物保管所经过三年的探访，终于在1984年于内丘县城关附近发现了窑址28处，这是一个重大发现。^①调查表明内丘邢窑始于北朝而终于元，中唐时为盛烧期，除白瓷外，还烧黑瓷和三彩陶器，晚唐时衰落。内丘邢窑发现后，李肇《国史补》记载的“内丘白瓷瓿”由此得到了证实。窑址发现碗底刻“盈”字的多达二十几件，1957年在西安唐大明宫遗址我曾发现过一片，由此可证带“盈”字的邢窑白瓷属于唐代宫廷用瓷；此外，带“盈”字还有邢窑白瓷盒二件传世器，当然也属宫廷用瓷。邢窑带铭文的还有底刻“翰林”二字的白瓷罐，1957年我在陕西博物馆看馆藏出土陶瓷时见到两件，胎釉洁白无疵，底无釉直刻“翰林”二字；在西安市发掘工地的医疗站内，桌上放一唐代白瓷罐，造型胎釉与前者完全一样，底部也直刻

“翰林”二字。这三件邢窑白瓷罐当属翰林院定烧器物。近几年内丘出土一件带“翰林”字铭白瓷罐，进一步证明西安出土三件是邢窑产品。值得高兴的是邢窑三彩陶器的发现，以往只知巩县烧三彩，内丘和黄堡唐代三彩陶器发现后，为研究唐代三彩增添了新资料。

二、扶风法门寺出土秘色瓷 1987年4月扶风法门寺塔基地窖出土了2499件珍贵文物，消息传出后轰动一时，成为国内外文物考古界和报纸上的头号新闻。1988年3月部分文物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沉睡千年的唐代秘色瓷第一次公诸于世，使人们看到了它的庐山真面目。秘色瓷名称最早见之于唐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长久以来为谈瓷的人们所津津乐道，陆龟蒙用千峰翠色形容秘色瓷颇富诗意。五代徐寅《贡余秘色茶盏》诗有“陶成先得贡吾君”句，一语道破了秘色瓷贡奉给后唐李存勖的事实。《十国春秋》记载吴越国钱镠、钱元瓘和钱佐三次向后唐、后晋朝贡，贡物中都有秘色瓷器，但没有解释秘色的含义。宋代《侯鯖录》则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高斋漫录》、《清波杂志》也有类似记载，都解释秘色瓷是供奉之物，臣民都不能使用。五代、宋代文献记载有一个共同点，即秘色贡瓷时间为五代；在较长的时间里，谈瓷的人也都这样理解。13件秘色瓷出土后改变了以往的认识，秘色瓷早在中唐以前已经成为懿宗皇帝的御用器物。咸通十五年（874年），懿宗把一大批珍贵宝物赐给法门寺，地窖里13件秘色瓷都用绘画仕女的纸包裹，外用红绸包裹，放入红漆竹编圆盒之内，圆盒放在正中央的银炉之下。放的位置是非同一般的，是对待珍宝采取的相应措施。13件秘色瓷在碑刻物账上称之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这些秘色瓷不仅使人们知道它的名称，而且通过实物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与瓷质。它们之中两件银棱碗釉呈青黄色，11件均为青绿色。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一书中曾形容其釉色如“一泓清漪的春水般的湖绿色”，他长年居住杭州，对春天的西湖有深切体会，这个比喻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地窖中还出土一件秘色八方瓶，物账中没有这件器物。八方瓶造型规整，釉色纯净亦呈湖绿色。1956年西安张叔尊墓出土一件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方瓶，时间比地窖所出者早三年，造型基本相同^②。1954年与陈万里先生调查上林湖越窑时曾采集过同类八方瓶残片，三者可以对比，也为唐秘色瓷具体烧造地提供了线索^③。

三、耀州遗址大面积发掘 继1959年、1973年两次小面积发掘之后，1984~1991年进行了第三次发掘，这次持续时间长，发掘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出土了唐、五代、宋、金及元代陶瓷标本一百多万片，发掘面积之大与出土文物之多，均居国内古窑址的首位。唐代烧制品种有黑釉、白釉、青釉、褐黄釉、花釉和茶叶末釉，彩绘有黑釉黑彩、青灰釉白彩、白釉绿彩以及三彩陶器。黑釉乌黑光亮居唐代黑瓷之冠，茶叶末釉色纯正，能控制烧成统一的色调，花釉与河南鲁山、禹县、郟县、内乡同属一个品种，即《羯鼓录》中所说的花瓷，标本以拍鼓为主，胎厚重，形式与鲁山窑基本相同。黑釉黑彩主要在盘的内部，盘中心以黑釉画纹饰，纹外用黑釉画五角或六角边饰，盘内纹饰有一百余种，极为丰富。青灰釉白彩是在胚上以白釉组成纹饰，然后施青灰釉，白色纹饰在釉下，纹饰凸出釉面，有立体感，这些品种具有地区特色。三彩陶器出土一千多片，器形有注子、注碗、弦纹碗、杯、塔式罐、炉、莲瓣座、犀牛枕、坐狮香薰以及兽吻等建筑构件；此外还出土有低温酱釉瓶、枕等器。三彩陶器以深黄及绿两色为主，色调偏暗，与巩县明显不同；耀县唐墓出土有三

彩马，骆驼及武士俑，马及骆驼形体小而瘦，与西安、洛阳唐墓出土者也有区别。五代时期出土物以青釉为主，釉作青绿色，与唐代青灰色相比有很大变化，似是受到越窑秘色瓷影响。器物胎体薄而精巧，有镂雕、浮雕、贴花、划花装饰器物。碗多满釉支烧，碗底有刻“官”字铭文的，应是皇家贵族的用品。葵式套盒、托子与盘等器与越窑近似，可以看出两窑之间的关系。多年前流散到国外的一些宋代浮雕牡丹纹狮流、鸡流壶，多年来一直称之为“东窑”，文献记载中宋有东西二窑务，但主要烧制砖瓦建筑器材，并非瓷窑^④。四十年来在河南开封附近没有发现窑址线索，因此东窑烧青瓷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实物根据的。可是在耀州窑出土遗物中狮流、鸡流壶不断发现，而且数量很多。由此可知传说中的所谓“东窑”，实际上是耀州窑产品，今天应当还它以本来名称，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宋金时期出土物最多，仍以青瓷为主，少量烧黑、白、酱釉器物，断代、分期与1959年第一次取得成果基本相同。宋代刻花有高大的瓶，表明了宋代烧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刻花刀法犀利，线条生动，每件作品都表达了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元代渐趋衰退，工艺简单，风格粗犷，器物胎厚，釉色褐黄；白地黑花属新兴品种，造型、纹饰、色调与磁州窑明显不同，与甘肃出土物比较接近，具西北地区特色。

四、宝丰汝窑的发现 汝窑遗址以往一向认为在临汝县，四十年来去临汝踏查者络绎不绝，但迄今未发现汝窑遗址。1986年10月下旬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西安年会期间，宝丰瓷厂王留现携带一件宝丰清凉寺遗址出土的汝窑洗，与会者均感意外，以得知汝窑遗址可能在宝丰而欣喜。上海博物馆11~12月两次派人前往宝丰清凉寺调查，共采四十余件典型汝窑碎片、支烧具及火照等标本，证实了汝窑遗址确在宝丰清凉寺，终于解决了汝窑的一大悬案，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大事。继此之后，1987年10~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组成发掘队又对宝丰清凉寺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钻探结果表明，遗址面积为25万平方米，保存较好的为9万平方米。试掘面积为200平方米，清理出窑炉、作坊及灰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窑具及较完整的瓷器300余件。其中20几件胎质细洁、釉质滋润，满釉支烧的典型汝窑器皿，与国内外重点博物馆所藏的汝窑瓷器相同^⑤。20件汝窑瓷器中两件带刻花装饰，一件瓶刻缠枝花卉，一件盏托刻复线莲瓣纹，均属罕见。试掘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并取得了重大收获。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继定窑、耀州窑之后为宫廷烧制瓷器的第三个瓷窑。汝窑烧官廷用瓷时间较短，以后为官窑所替代。正因如此，生产的数量不多，南宋时已很罕见，因此历代均被视为珍宝。今天留存下来的只有一百件左右，是博物馆中的珍藏品。宝丰清凉寺窑以烧民用瓷为主，宋金时期印花刻花青瓷属耀州窑系，金元时期白地黑花、三彩陶等属磁州窑系；金元时期也烧钧窑系作品，属于综合性瓷窑。汝窑产品仅占很小部分，似属官搭民烧性质，与定窑、耀州窑情况类似。这次试掘面积太小，20几件汝窑瓷器又多数出于灰坑之中，汝窑烧官廷瓷器作坊及原料产地等问题尚不清楚，这些都寄希望于今后大面积发掘时予以解决。

五、广东地区的唐代青瓷窑 广东省唐代青瓷窑过去发现了潮州窑、新会窑、高明窑和三水窑四处。80年代梅县水车又发现了一处唐代青瓷窑址，并经过小规模试掘。出土了一批碗类标本及窑具。梅县唐墓出土了十几件完整梅县水车窑器物；有壶、双系罐、双系瓶、鱼形瓶、洗与碗等器物。胎釉特征、支烧方法与水车窑完全相同。梅县唐代青瓷釉层较厚，呈青绿色，开小纹片，这种特征与潮州窑很相似，具有广东地区特色。梅县窑在已

发现的广东地区唐代青瓷窑中以质量精、造型丰富而名列首位。唐代曾销往海外，泰国南部出土有唐代青瓷碎片，除越窑、长沙窑外还有广东梅县窑和高明窑碗片，这是目前所知广东最早销往海外贸易瓷的实物例证。梅县窑盛烧一种中唐以后流行的玉璧底碗，唐代各窑所烧的青瓷、白瓷玉璧底碗，底部不施釉。梅县窑与众窑不同，碗里外施满釉，然后在底部擦去三块釉，再放三叉形支具装烧，这一做法有其独特性，是区别梅县窑的一大关键。

六、景德镇明代御器厂发掘 1979年珠山明代御器厂发现明代宣德时期瓷器碎片后，引起了景德镇市陶瓷工作者的注意。1982~1988年间，在基建工程中又多次发现了永乐宣德时期瓷片，景德镇市陶瓷历史博物馆配合基建工程对遗址进行了几次小面积钻探与发掘，初步探明了明代御器厂的分布范围，出土了元代与明代永乐至嘉靖时期官窑瓷器碎片标本十几吨，取得了丰硕成果。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传世品较多，是多年来赖以进行研究的主要对象。明代官窑瓷器有款识的居多，不书年款的给判断年代带来不少困难。珠山御器厂遗址出土明代历朝瓷器碎片，为解决各朝瓷器的断代与分期提供了可靠依据。近几年景德镇发掘明早期遗址，永乐地层分为早晚两期，找出了早晚期的区别点与演变脉络；对永乐宣德两朝共有的器物，也找出它们的区别所在。梅泽纪念馆与出光美术馆收藏的两件明初青花松石花卉纹大盘都定为永乐时期，但它出土于宣德地层，纹饰与梅泽纪念馆所藏完全相同，纠正了鉴定上的偏差。西藏日喀则萨迦寺1984年发现大明宣德年制款斗彩鸳鸯莲花纹碗两件^⑥，长时期一直认为明斗彩始于成化时期，两件碗的发现，提早了斗彩出现的时间。1988年11月珠山御器厂出土有一件宣德款斗彩鸳鸯荷花盘^⑦，主题纹饰与色彩大体相同，又增添了一件宣德斗彩实物例证。这三件碗盘的里口都书写藏文一周，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斗彩盘有极大可能是宣德帝赐给萨迦寺的订烧物，由于有疵点未选中被打碎抛弃的。1990年珠山遗址出土了一批元代龙纹盒的残器，出土物中有的属于半成品，有的属于成品。半成品的盒片均为素烧坯，盒外绘褐色龙纹；成品盒片为绿釉，釉下为黑色龙纹。经试验两种龙纹的色料同属氧化钴，画在坯上外面不施釉的烧后呈褐色；而外面施绿釉的，绿与蓝色重叠在一起则呈黑色。景德镇元代绿釉黑龙以往未见过实物，新资料出土后丰富了对元代烧瓷品种的认识；其次，这一品种的出现可能是受宋金时期磁州窑绿釉黑彩装饰的影响。

回顾十年来围绕中国陶瓷史进行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已如上述，展望未来前景十分美好。预计十年内将完成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按省市编写，全书共三十二册。为了编好这部书，各省市对所辖地区的地上、地下文物进行详细调查，该书中的广东分册已先行出版^⑧。在调查中共发现古陶瓷窑遗址近千处，部分瓷窑已在分册中选入。窑址分布在粤东的梅州、潮州、汕头地区，粤北的韶关、南雄地区，粤南的广州、惠州、阳江地区，粤西的封开、郁南、德庆三县以及雷州半岛湛江地区。窑址以明清两代最多，宋元居第二位，唐代居第三位。其中窑址最密集的为潮州及湛江地区。广东省古瓷窑遗址的大量发现，为研究广东地区陶瓷发展准备了雄厚物质基础，为研究明清瓷器外销也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在全国志书编写会议以后，各县市已开展了调查与撰写工作。历来志书物产条多包含产瓷一项，新志书也保留这一传统内容，预计随着新县志的陆续出版，窑址将会大量发现，这是可以预料的。有关新窑址的资料将比《中国文物地图集》更详尽、更具体。这

两部书将成为今后研究中国陶瓷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

三、继 60 卷本《中国美术全集》之后，现正酝酿编辑出版 400 卷本《中国美术大全》，陶瓷由原来的三卷增为十五卷。陶瓷卷预计 1995 年出齐。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准备工作已着手进行，1992 年将陆续与读者见面。

四、浙江、河南两省是中国江南与华北地区瓷器发源地，四十年来两省古瓷窑遗址大量发现，墓葬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历代陶瓷。撰写浙江青瓷发展史与河南地区陶瓷发展概况的条件已经具备。此外，福建省古瓷窑遗址也在几十个县市发现，选择重点与有代表性的标本汇为一书，对于开展外销瓷专题研究将有较大帮助，同时可以解决东南亚地区出土瓷器的具体窑口问题。湖南省衡山宋元窑以铜铁金属为着色剂，沿着长沙窑传统继续烧造褐绿两彩器物；湘阴、汨罗两窑宋元器物又具有湖南地区特色。新资料的出土又一次展现了各地陶器的丰富多姿。

五、以展示一个瓷窑为目的的古陶瓷博物馆行将出现。杭州乌龟山郊坛遗址是南宋郊坛官窑的产地，经过国内外陶瓷学者的多次调查之后，近几年浙江省考古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浙江省决定在杭州筹建南宋官窑博物馆，1991 年底以前将对外公开展出。通过南宋官窑博物馆展览人们可以概括了解到该窑的面貌。陕西省筹建耀州窑博物馆已进行了三年，1992 年行将建成，将继南宋官窑博物馆之后成为中国第二个陶瓷博物馆。除通过展览展示耀州窑全貌外，并编写耀州窑发掘报告，报告分唐、五代、宋、金元四部分，分别介绍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与装饰特色。博物馆建成与报告出版后，一部耀州窑发展史将会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冯先铭：原故宫博物院）

注 释

- ① 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 年 9 期 1~10 页。
-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介绍几件陕西出土的唐代青瓷器》，《文物》1960 年 4 期 48 页。
- ③ 冯先铭：《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笔谈》，《文物》1988 年 10 期 36~37 页。
- 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外诸司……东西二窑务……”；《宋会要》窑务：“……京东西窑务掌陶工方砖、瓦器给营缮之用……”。
-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 年 11 期 1~14 页。
- ⑥ 《萨迦寺》图 95，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 ⑦ 《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图 17，1989 年香港艺术馆出版。
- ⑧ 《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陶瓷研究的科学与求实

——怀念先师陈万里先生

李辉柄

编者按：陈万里先生是将科学考古与陶瓷研究相结合的第一人，求实专注，不人云亦云，也不忌讳修正自己已经发表的观点。

今将李辉柄先生为《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所写的前言收入本书，希望古陶瓷的研究者、学习者对这样一位值得尊敬与追随的前辈有一些了解。

瓷器是中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近代瓷学研究史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文献考据阶段，一为考古调查发掘阶段。

陈万里先生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他认为：“照过去的老路——只靠点滴的文献史料进行研究，是无法取得显著成效的。”他为考查浙江龙泉青瓷，自1928年夏曾“八去龙泉，七访绍兴”，搜集了大量瓷片标本，进行排比研究，开辟了一条瓷器考古的新途径，从而，使我国陶瓷学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为现代陶瓷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1946年，陈万里撰著的《瓷器与浙江》一书，即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该书堪称是从传统的“书斋考古”迈向窑址考古的一座丰碑。陈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以纪年墓出土物件或墓葬器物的有关文字记载为依据，与窑址实地考察相印证，从而最先揭示出唐代越窑的面目。

陈万里先生（1892—1969）是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他早年从医，平生爱好颇多，研究过昆曲，能唱能演；喜好摄影，是我国老一辈的摄影家。自二十年代起，他又对我国陶瓷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他所有爱好之中逐渐占了上风。他的老朋友诙谐地说：“万里永远是在趣味中生活着的”。

陈万里是怎样从医学转移到考古学，从事瓷器研究的呢？他说：“龙泉青瓷的调查，当初在我原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之下所附带的工作。可是到了龙泉，往大窑、八都去走走，着实引起我不少的兴趣，有时还因一时的感慨，鼓舞起来的勇气，竟不自度量地想在这方面有点贡献，其实正可说是等于痴人的说梦。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开始了。”“自此以后，我因为致力于别的方面的事业，……第一次在龙泉时所得到的感慨，所鼓舞起来的一点勇气，也慢慢地冷淡而消沉下去。可是，事情真不逆料，我从去年夏天起，对于研究龙泉青瓷的

意念，竟会复燃起来。当时所得到的感慨，比之第一次在龙泉时所得到的还要强烈，因而所鼓舞起来的勇气，也要比之先前增加得多，于是就促成我第二次龙泉之行。”“未来的问题亦就愈觉得多起来了，而所要设想得到龙泉青瓷的结论，反觉得渺茫得很。因此种种感想在我脑海里回环往复，不能自己的缘故，于是我之研究兴趣益发浓厚起来，准备着在将来有第三次第四次之实地调查。”（见《青瓷之调查及研究》引言）陈万里先生就是这样踏上了陶瓷研究之路。

瓷器烧制技术是我国发明的，然后才传播到其他国家，所以中国在上博得了“瓷国”的称号。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瓷器的研究却很少，很落后。陈万里先生曾因“以数千年陶瓷著称的中华，竟没有一部陶瓷史”而感慨。当他目睹“最近旧瓷碎片之成箱装运外都者尤多……国人茫然视之，意不以为宝”的状况，而“因此发奋，愿以视察之余暇从事勘察，勘察之后，试记大概，以唤起国人之注意，自问固鄙陋，亦不暇计矣。”为什么陈先生对瓷器的研究有如此兴趣，并且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一事业，这恐非是单纯的“爱好”了。

研究瓷器发展的历史，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是不可缺少的两大方面。陈先生在注重文献史料的同时，对于实物史料同样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评吴仁敬、辛安潮所著的《中国陶瓷史》时写道：“这本书的最大毛病，就是采取几个陈旧瓷书里的内容，因袭着以往的传说，作为正确的史料，几乎成了一种类书，不是一部陶瓷史。”他明确指出对于中国陶瓷的研究光靠文献是不足的，还必须取得实物资料并进行古瓷窑址的实地调查与发掘工作。陈先生八次赴龙泉进行古代烧窑遗址的实地调查，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动。

实物史料除传世品外，即来源于古瓷窑址调查与古墓葬发掘两个方面。窑址调查的目的，是为弄清各窑烧造器物的特征，以便区别窑口，正确判断瓷器产地。陈先生说：“拿了一件物品，要判断他的窑名，确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有此原因，极愿意跋涉许多路，仅仅搜寻十余片断裂破片的瓷质。”可见，陈万里先生判断瓷器的窑名，是建立在对窑址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墓葬发掘，特别是具有确凿纪年的墓葬出土器物，可以科学地印证古代窑址的时代。为此陈先生通常是以带纪年的墓葬出土物为依据。譬如，他对越窑瓷器的研究就是这样。越窑瓷器在唐代文献中均有一些记载，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唐代的越窑是怎样？谁也不能予以肯定的答复。是陈先生在《唐代越器专集引言》中，第一次作出了回答：“前年在慈溪鹤鸣场出了一块长庆三年（823年）的瓷墓志，从此可以考定上林湖方面的造瓷的年代，至少可以看出长庆那时候出品的样子，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最近绍兴发见古坟很多，漓渚项里各处，并有黄龙太康砖发见。在古城的一个坟里竟有一块墓志砖，证明是唐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叔文）夫人之墓，同时出土的物件，有越器，墓志砖上有唐元和五年年号（810年）……足以证明坟里所出土物的时代。”“元和五年早于长庆三年计十四年，瓷墓志所表示的当时唐瓷的情形，现在证以元和五年，已有这样优美的制作。”

我国的陶瓷研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文献史料上。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才出现了陈万里以古窑址实地调查与墓葬出土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代表作就是《瓷器与浙江》。从这个意义上看，陈万里先生不愧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瓷器的开拓者。

五十年代以来，陈先生继续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前进，他不辞辛苦地走遍南北各地，调查了许多窑址，发表了一些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1957年，我与冯先铭随他赴福建、广东

进行窑址调查时，他已年过半百，但是精力十分充沛，爬山涉水，兴致勃勃。我记得，曾问他累不累，他回答说：“这是常有的事。”这可在《龙泉访古记》中回味一些情景：“司机要用午饭，停留十五分钟。我则以花生米充饥，在我此实为寻常事，我于旅行并无其它特长，自审能耐劳吃苦四个字而已。……我自己晓得不配做阔老，只好谨守此四个大字。”陈先生曾意识到从事陶瓷研究这一事业的艰难，虽然他有过这样的决心：“我不怕难，一直这样摸索着这一条黑暗弄堂，希望未来的光明，不久就会涌现在我的面前”。但是仅仅靠他自己单薄的力量毕竟是不行的。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先对龙泉窑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和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继之考古工作者对全国古代瓷窑遗址进行普查，并对重点瓷窑进行了发掘，为全面综合性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陈先生多年以来希望得到的青瓷研究的结论实现了，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青瓷史略》是他对于我国青瓷研究的一个基本总结。

研究中国瓷器发展史，首先应当了解与学习陈万里先生的著作，因为他是瓷学划时代的代表。陈先生致力于瓷学考古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筚路蓝缕，卓有建树。如，他在《瓷器与浙江》一书中的许多论证已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使后人不能不钦佩陈先生的灼识玄鉴。为了纪念这位瓷学巨擘，为了满足学界及广大读者的渴求，也就是该书这次再版的目的。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中国新瓷学的开拓者，而且是中国新一代瓷器研究人才的园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在陶瓷考古与科研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当说与陈万里先生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陈万里先生学识渊博，他的文章涉及的内容也较为广泛。本集主要辑录了有关他对中国古代瓷窑遗址调查、中国瓷器发展史的研究以及考古方面的主要著作。分四部份组成。

第一部份《瓷器与浙江》是1946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堪称是陈先生早年力作。主要内容是浙江越窑与龙泉窑青瓷，其中包括曾单独印行的《青瓷之调查及研究》（第一集），《越器图录》以及《瓷器与浙江》等。这次辑录，仍按中华书局版《瓷器与浙江》原书顺序排印。

第二部份《中国青瓷史略》原系1956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继《瓷器与浙江》之后，根据考古新发现，对越窑与龙泉窑青瓷所作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还对北方青瓷的发展，我国青瓷的对外输出等重要问题，也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为了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本文集也未作更动。

陈万里先生陶瓷研究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基于对古代瓷窑遗址的实地调查。继对南方瓷窑遗址的调查之后，五十年代初期，他又着重对北方瓷器进行了研究。首先他调查了古代瓷窑较集中的河南、河北两省，发表了《调查平原、河北两省古代窑址报告》。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随后又发表了《邢、越二窑及定窑》、《谈当阳峪窑》、《禹州之行》、《我对耀瓷的初步认识》等文章。《一九五〇年以来对于古代窑址的调查》一文则是他对五十年代十年间陶瓷考古的一个基本总结。这些文章连同这一时期的其它文章一并编入本书的第三部份。

附录部份收集了1926年朴社出版的《西行日记》和1930年开明出版的《闽南游记》。这两部游记反映了陈先生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在经历五六十年历史变迁后的今天，回